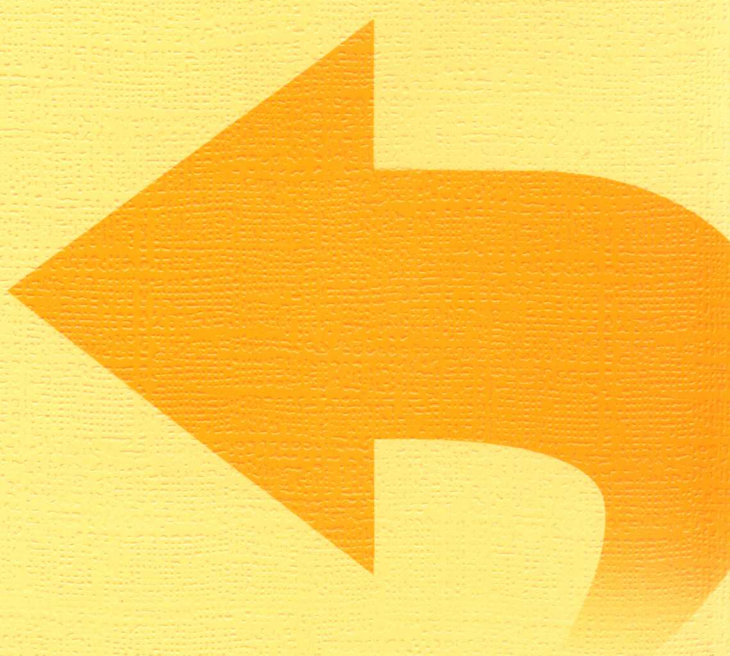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上海的美國人

社區形成與對革命的反應 (1919-1928)

【美】何振模著 張笑川 張生 唐艷香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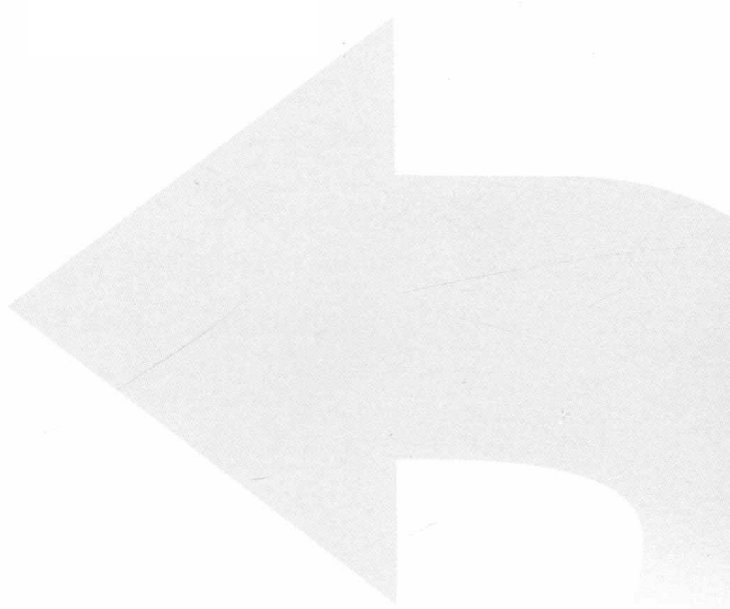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上海的美國人

社區形成與對革命的反應 (1919-1928)

【美】何振模著 張笑川 張生 唐艷香譯



上海辭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美国人:社区形成与对革命的反应:1919~1928/(美)何振模著;张笑川,张生,唐艳香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11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6-4272-4

I. ①上… II. ①何… ②张… ③张… ④唐… III.
①地方史-研究-上海市-1919~1928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479 号

2014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国研究资助项目“上海美国人社区与 20 世纪的中美关系”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上海美国人:社区形成与对革命的反应(1919—1928)

(美)何振模著,张笑川、张生、唐艳香译

责任编辑/赵航 封面设计/姜明 版式设计/杨钟玮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965 毫米×635 毫米 1/16 印张 14.875 插页 1 字数 173 000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272-4/K·986

定价:4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66700301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资助项目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编纂委员会

主任

熊月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强 卢汉超 李培德 何一民 宋钻友
张利民 金大陆 承载 梁元生 熊月之
黎志刚 戴一峰

陌生人 在我的门口
他也许 真诚而且友爱
却不会讲我讲的话
我无法感知 他的想法
虽然看到 面孔、眼睛和嘴巴
后面 没有灵魂 在守候

与我同一祖先的人
他们做着 蠢事和好事
他们对我撒谎 我已习惯
他们也习惯于 我的谎言
彼此不需要解释
我们默然的买进 卖出

陌生人 在我的门口
他也许邪恶 或者善良
但我不能分辨 什么力量 什么原因
左右 他的心情
当上帝降临 遥远的土地
他的鲜血 也许复得

——吉卜林《陌生人》(节选)

濒海城市易于遭受腐败的影响并导致道德堕落,因为它们不仅受到外国语言形式的影响,还受到外国行为标准的影响。在外国商品进口的同时,外国的道德准则也进口了,导致的结果是,沿海居民的传统习俗不再能够保持不变。

——西塞罗《论国家》

总 序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城市的出现均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城市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还是近五十年的事。

近代以前,城市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随着 18 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180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3%。1900 年上升为 13.6%。2007 年 5 月 23 日,世界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50%,也就是说,世界城市人口从此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在 1949 年的城市化率为 10.6%。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至 2008 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 46%,有 655 座城市,其中百万人以上特大城市 122 座,超大城市 39 座,有 6.07 亿城市人口,地级市以上城市的 GDP 已占全国的 62%。

无论在世界,在中国,城市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地位的日益加重,城市史研究突飞猛进。

在西方,城市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城市史

开始受到重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于发达国家二十年,但大体上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提速同步。1986 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史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城市史研究的整体重视。此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呈井喷之势,疾速发展,各种城市史论著,包括单体城市研究、城市群研究、不同类型城市比较研究、城市史研究方法研究等,姹紫嫣红,目不暇给。与此相一致,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快速发展,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苏州、扬州、自贡等均有专著出版,其中对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研究成果尤为丰富。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已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国内外不同学术背景的机构、学者就城市史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已是常态。前几年,我们选译过一套《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凡 12 本,颇受学界重视,但也有诸多遗珠之憾。有鉴于此,我们选译了这套《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意在介绍海外学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就风格而言,这套书是《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的继续,就范围而言,则是《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的放大。

翻译本是苦活,加上研究单位在成果考核时,多不给译作计分,这样,此项工作的推进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令人欣慰的是,有一批学者乐于此道,志在学术,甘于奉献。我们相信,此项工作对于繁荣中国城市史研究、提升中国城市史研究水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众擎易举。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同行加入进来!

熊月之

2009 年 10 月 28 日

作者的话

请原谅我对本书中文版迟到的祝福,因为我正没日没夜的忙于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我们很高兴看到胡锦涛主席驾临峰会,这对于下月在纽约举行的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更将促进中美两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方面的共同努力。

得悉你们翻译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感到很荣幸。我乐意授权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由其负责本书中文版的一切事宜,并可用于其他学术用途。通过研究,我非常热爱上海这个城市和她的人民。1984年,我作为里根总统访华代表团成员首次来到上海后,这种爱与日俱增。

本书研究的是近代上海乃至中国历史上一段动荡岁月,该时期是中美关系历史中的一小段,迄今仍在这个伟大城市的历史里闪耀着光芒。我曾花费数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上海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阅读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这些材料部分的展示了该段时期发生在中国非常有趣的故事。

我对美侨社团兴趣深厚,特别是这些强势的外侨社团如何在上

海这样的城市工作？这些有特权的外国人与当地中国社群有怎样的联系？美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是否影响了他们？社区中的美国人与当地中国人的感受如何？我尤其着迷于上海美国商业社群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联系，从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如何相互影响，对于日益汹涌的改革、革命的潮流又作出何种回应？

总之，从“五卅”事件到北伐战争的来临和结束，对于研究外侨社团及中外商业精英互动，上海的确是个令人着迷的案例。

祝愿本书在中国顺利出版。

何振模(James L.Huskey)博士

2010年4月21日

序 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岁月,上海是大多数美国人移居中国的目的地。它是在华外国企业和居民的中心,长江流域城市的女王,中国最重要的“首位城市”,以及中国与现代世界连接的枢纽。¹ 上海包括三个实体——华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两租界的庞大存在支配着上海这座城市,形成“国中之国”。实际上,上海是数个外国列强的联合殖民地。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如同封建君主一样,凌驾于中国居民之上,传播着一种都市“殖民主义文化”。同时,华人占人口的96%,上交税收的三分之二,承担着公共租界为外国居民所办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三。其他许多因纳税而应享受的服务,将华人排除在外。最为人所知的是,(华人不能进入)租界公园,不能在租界以自己的名义拥有财产。²

这是一个从民间的非正式层面进行的国际关系研究,聚焦于统治上海的外国飞地中的美国人。首先,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鲜明的美国人社区的形成;接着,考察上海美国人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个阶级正在崛起并分享了战后席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最后,讨论1925—1928年国民革命对上海美国人社区及其与亲美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的影响:国民革命的危机促使上海美国人和中

国人关系的转变,时至 1928 年,二者关系日益倾向平等主义,并且最终区别于旧的殖民主义文化。³ 本研究的观点是,美国人社区中可以被称为“世界主义者”的一部分,在建立上海外国人与中国居民新型关系的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

海外美国人社区研究,是 20 世纪美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却未被触及的领域。20 世纪开始后,海外美国人的增长和持续存在,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日益重要的因素。正在资产阶级化的成员,以及成长中的各种职业群体:商人、工程师、医生、军人、教师、传教士、广告专家、学生和家庭主妇等极大地扩张了美国在海外的存在。⁴

在这些世界性的大城市中,美国人社区的随之形成,进一步改变了海外美国人的身份和角色。通过这些社区,以前作为海外美国人基本认同的旧的职业和制度上的忠诚削弱了,国家认同开始走到前台。这些社区成为美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些社区是国家之间关系形成的一个能量渠道。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江昭(Akira Iriye)所说,这些社区居民在两个方面是重要的“想象塑造者”:他们是向祖国传回想象的渠道,同时也直接在当地居民中创造想象。⁵

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这种私人层面的非正式关系的发展并未受到重视。相比而言,美国获得世界权力的过程更加瞩目。但是,近年来一部分外交史家已经意识到,需要更加注意和研究外交关系中非正式的、私人的维度。托马斯·麦考密克(Thomas McCormick)呼吁,既要考察美国海外扩张“对其他社会的影响”,也要研究海外美

国人制度化和习俗化的日常生活。迈克尔·哈特(Michael Hunt)强调,需要“新的焦点”以考察“海外美国企业在经济影响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影响”。⁶

20世纪初,美国人在中国商业、宗教、教育中的私人存在增长巨大,给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带来重要影响。到20年代,美国人在华的私人、非正式层面的经验和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成分。这10年,中国中央政权处于最衰落时期;这一混乱时期正如一句中国格言所说,“天高皇帝远”。而且,美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克制阶段:炮舰外交在一战后不再流行,华盛顿开始缓慢地、或许有些痛苦地转向一种更加平等的对华关系。在这种环境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及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主要通过在中国的私人组织和个体居民。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尤其明确,正如刘广京(K.C.Liu)所说的:大体上,在非政府层面与美国的联系——通过商人或企业家、传教士、教育家、科学家,以及学生和其他游客,比任何美国政府的直接行动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在中国,美国的文化和经济影响毫无疑问比其政治影响更重要。⁷

这种非正式外交在上海最为重要。一方面,上海美国人是本土中国人对美国想象的重要来源。美国人与受教育的上海上层华人更加亲密的日常联系,使他们意识到了美国人与其他上海外国人存在差别,虽然在中国大众心目中,上海美国人依然被认为具有外国人的普遍态度。确实,美国的生活方式、消费产品、电影的影响,在这些中国精英中是显著的。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美国人日益成为华盛顿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他们的存在(即便不是他们的利益和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相当的抑制效应。

对上海美国人社区的考察,是关于美国外交史其他两个方面的个案研究。首先,它清楚地表明了中美的“特殊关系”。从最初接触时期开始,美国人已经确信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某种亲和力和理解力,以及美国对华政策是特别“仁爱”和“无私”。就算是中国不这样看,但在美国人眼里这种美国人对中国的“例外论”和“仁爱论”,使之区别于其他外国列强。从历史形象的角度来看,英国官方贸易政策强迫中国吞下了鸦片战争的苦果,英、法的强力策略又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而美国则推行了19世纪60年代的“合作政策”,让列强们帮助中国政府在这个被内战破坏的国家重建秩序。此外,20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之后的归还庚子赔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信念,并且向美国人证明,美国人仁慈的自我形象和存在中美“特殊关系”的真实状况。1914年,哈特发现,以“门户开放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特殊关系”思想成为一种国家信念。⁸

中美关系史家却并不仁慈地对待这种想象。他们认为,美国商人在19世纪的鸦片贸易中相当积极,美国人分享了对华条约中“最惠国”条款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并间接参与了这项强权政策的推行。在消除这种自我形象的神话色彩之后,历史学家进一步声称,关于中美“特殊关系”的想象是一个“迷思”,完全是“自欺欺人”。⁹

但是,关于中美“特殊关系”的想象不应作为纯粹的神话如此轻易地、无条件地抛弃掉。在19世纪和紧随门户开放声明之后的岁月,这种想象绝大部分确实是神话和自欺。¹⁰但是到最后,“特殊关系”超出了仅仅作为神话的内容,这种形象实际上确实触及了一部分现实内容。尤其是在1928年,新组建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建

立了一种“特殊关系”。于是，在二战期间及其后，当中美“特殊关系”变成美国对华政策的公理，这种想象开始决定政策。

在上海非正式层面的中美关系中，一个相应的演变发生了。1927—1928年，上海美国人与中国人发展的平等主义相互关系，是两国之间“特殊关系”的一个地方版本。这种转变，通过1925—1928年华盛顿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调整变得可能，同时也是促成华盛顿与蒋介石政府所在地南京之间日益增长的一致性的因素之一。这种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特殊关系”的观念，就这样渗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正式和非正式层面。这种“特殊关系”在之后的45年中基本保持不变，直到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后又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美国人在隔绝20年后开始重建文化和教育交流网络，并再次鼓吹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之时，他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其次，这个关于上海美国人社区的研究，从微观上阐明了美国对20世纪20年代革命的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美国在国内动荡局面之外，面对着一个革命世界——首先在苏联，接着在中美洲和中国。最初面对本国社会主义者和国际工人组织的革命，美国在1919年进行了镇压；后来有了俄国革命，美国不承认并实施围堵政策。直到20年代中期，遥远的中国和美国近邻尼加拉瓜、墨西哥的革命运动兴起后，这种反激进主义的歇斯底里才消退了。¹¹

在20年代，美国试着逐渐调整以面对拉丁美洲、苏联和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现实。¹²1927—1928年发展起来的对墨西哥、尼加拉瓜和中国革命的更加开放、实用的态度，是弗兰克·B.凯洛格

(Frank B. Kellogg)担任国务卿期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贡献。美国这种对革命的反应,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国际上,采取渐进的、自由主义的改革,而不是通过反动的蓄意阻挠。这是美国对 20 世纪国际关系的显著贡献。¹³ 这种调整,对于战后革命是一种挑战的、务实的、甚至创造性的回应。

相应地,美国人社区的领导也开始调整,目的是适应包括激进革命运动在内的战后国际政治局势。詹姆斯·韦恩斯坦 (James Weinstein) 称,这种已经成为本土美国社区特征的政治实用主义叫做“社区自由主义”,工团主义的安排在大企业对付美国主流工人运动之时已经产生。¹⁴ 这种美国政府和商人的共同管理,在进步时代和战后岁月发展起来,通过与海外贸易紧密关联的公司延伸到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些大社区领导采取了更加善于适应环境的姿态,面对诸如在 20 年代中国发生的那些民族主义运动;相比之下,本土和海外的小公司则依然反对一切形式的激进变革。¹⁵

美国人对革命的两两相互冲突的反应,具体而人微地体现在上海美国人对中国 1925—1928 年国民革命的态度。大多数于“一战”期间及其后来到上海的美国人是独立小商人,背负着从战争期间与战后不久的美国所带来的反激进主义的文化包袱。但是在中国革命危机的高潮中,第二种态度产生了:一小部分具有国际视野的美国人回应中国人的不满和激进主义,宁愿采用改革而非镇压。正如我们将称呼他们的那样,这些“世界主义者”,寻求适应中国民族主义者中最驯服的那部分人(具有国际头脑的中国商人)的要求。

注释

1 关于上海在现代中国商业和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参阅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4, 及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China and Ind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6), p.226; Mark Jefferson, "The Law of the Primate City,"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29(April 1939), pp.226—232; John Orchard, "Shanghai,"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21 (January 1936), pp. 1—2; JA 1926, pp.46—47;《上海外滩南京路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6 页;以及 Li Jen-ch'u【译者按,疑为朱仁昶,查台北《东方杂志》1972 年 1 月载有朱仁昶《上海租界史话》一文】:《上海租界史话》,《东方杂志》(台北,1972 年 1 月 1 日),第 68 页。

2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134 页;及 John Useem, "Work Patterns of American in Indi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8(November 1966), p.146.也可参阅 John Carter Vincent, *The Extraterritorial System in China: Final Phase*,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6. 以及 Jan Morris, "A terminal Case of American Perpetuity," *Rolling Stone* (January 1, 1976), p. 48. John Useem 认为,“殖民主义文化”是外国人和本地人之间一种不平等的、上级和下属的关系。("Work Patterns of American in India," p.146)

3 参阅 Useem, "Work Patterns," p.146; 以及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The Rise to Self-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3 and 6.

4 Harlan Cleveland and Gerard J. Mangone, eds., *The Art of Overseasmanship*,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2; 以及 Kuang-ching Liu, *Americans and Chinese: A historical Essay and Bibl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4.

5 Harvey M. Upchurch, "Toward the Study of Communities of American Overseas," (Alexandria, Va.,: Human Resources Organization, 1970), pp.3—4、15、17; Foster Rhea Dulles, "Historical View of American Abroad,"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8 (November, 1966), p.18; Akira Iriye, "Introduction" to Akira Iriye, ed., *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8; 以及 Li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4.

6 Thomas J. McCormick, "The State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载 Herbert J. Bass, ed.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pp.132—134; 及 Michael Hunt, "Americans in the China Marke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1890s—1931,"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1(Autumn 1977), 306. 也可参阅 Li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8.

7 Li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8. 也可参阅 Paul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1935), p.65; 以及 Margaret Mary Wood, *The Stranger: 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Columbia Press, 1934), p.173.

8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02.

9 John K. Fairbank, *China Perceived: Image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p. 94; 以及 Daniel Matthew Gra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rofit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Benevolence," 未出版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74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 75—4674]), p.2. 对“一战”时期中美“特殊关系”历史最深入的研究, 是哈特的最新著作《特殊关系的形成》, 尤其参阅最后一章《特殊关系的历史考察》, 第 299—313 页。

10 John K. Fairbank, *Chinese-American Interactions: A Historical Summa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0; 以及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p.302—303.

11 参阅 Joyce Kathleen Bibbe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s Viewed by the American Periodical Press, 1920—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1969,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 69—13928]), p. 23; Stanley Coben, "The American Red Scare of 1919—1920,"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1964), pp.52—75; 以及 Robert Moats Miller, "The Ku Klux Klan," 载 John Braeman, ed., *Change and Continuity: The 1920'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15—255.

12 关于这种转变以及美国社区对于革命日益实际的容忍态度的讨论, 参阅 Peter Filene,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Ethan L. Ellis, *Frank B. Kellogg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25—1928*,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1); 以及 Robert Freeman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n Mexico, 1916—193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 这种观点同时出现于桃乐茜·鲍格 (Dorothy Borg) 和伊桑·L. 爱丽思 (Ethan L. Ellis) 的著作中, 他们认为, 凯洛格以及国务院的中国政策, 比入江昭所认为的更加一致、积极和具有创造性。参阅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New York: Octagon Books, Inc., 1968), "序言"和"结论"; Ellis, *Frank B. Kellogg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25—1928*, pp. vii—viii and 105—140; 以及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07—109.

14 James Weinstein, *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参阅第 8 章, 尤其是第 251—254 页; 以及 Thomas McCormick, "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December 1982), pp.324—329. 也可参阅 John Braeman, "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Age of Normalcy: A Re-examination," *Business*